

手艺人刻画出的时代线条

本报记者 王云峰

手艺人的人生折射出历史与当下

中央电视台的《大国工匠》让“工匠精神”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词语,如何培养“工匠精神”更成了热门主题。其实,我们从来都有“工匠精神”,它就沉淀在无数的手艺人身上。《手上春秋——中国手艺人》系统而忠实地呈现了十位传统手艺人的人生沧桑和手艺传习。本书通过写手工艺人,打捞传统文化,挖掘精神内涵,呈现出中国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,以及它对当代中国的启示作用。



《手上春秋》这本书属于田野调查,以获得民间的、社会的、现实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,依次写了木匠、药师、制茶师、壮族女红、捞纸工、铁板浮雕师、夏布绣传人、棉花画传人、八宝印泥传人、成都漆艺传人、蜀绣传人、蜀锦传人、锡伯族弓角传人、平乐郭氏正骨传人等十位知名手工艺传人。这些人来自中国的东西南北中,基本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。

可以看出,作者对人物的选择倾向于与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相关的手艺。之所以这样选择,是因为,“正是这些门类及技艺几千年的存在,才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在的模样,换言之,虽然一些技艺逐渐退出当下生活,却如盐入水,融入我们的历史与思想,成为我们精神血肉的一部分。”

人物的年龄较大,从50多岁到80多岁不等,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药师。“一般来说,年长者的人生经历要更丰富一些,他们对技艺的感受要更深入一些,对传承转合的痛感也会更强烈一些。”

书里面对宣纸制作、锦绣、中药炮制等工艺流程的描写,让读者对中国的手工艺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,并能充分感受到传统技艺的博大精深。除了行当

与技艺,书中还重点呈现了各路传人的艰辛与企盼、灼痛与欣慰、彷徨与坚定……

木器农具的传人文业成几十年来所做的犁耙、谷磨、秧盆、水车、风车、鸡公车等农具不计其数,他的收藏很丰富,但是南方潮湿,这些收藏大都岌岌可危。尽管他是深圳木器农具列入非遗项目之后的第一个传人,却可能也是最后一个,因为深圳已无农田,不再使用“原始”农具了。

曾有人亲视老药师黄文鸿炮制自创的治疗肝癌的药——荷包金龟的全过程:煅、煅、闷全部在炉火中进行,肉眼看不见,全凭听声音,而且一环扣一环。

可如今,作者再替朋友向黄老求药时,得到的回答是:一则年事已高,再来炮制,力有不逮;二则,他后来从事药业工作,已无行医资格,目下中医处方也要求严格,不宜违反。

制茶师杨胜伟向作者坦承,玉露茶的手工技艺也面临机械化严苛的挑战。传统熟练一天只能做二十斤干茶,大厂机械加工一天能处理上万斤鲜叶。更严峻的问题还不是手工与机械之争,乃是真与假、好与次之争。

因玉露品牌价值连年走高,一些作坊或厂家求利心切,以次充好、以假乱真的现象泛滥,造成“劣币驱除良币”,一损技艺传承,二损名牌声誉。

作者于是感叹:“倘若哪一天,他们走了,带走的遗憾就不仅仅属于他们,更属于子孙后

代。”因为,传统手工艺的产生、发展及传习,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,更将中国人生存和生活的智慧沿袭下来,具有文化传承作用。

作者发现,传统手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巨大。作者采访了成都漆艺传人,才知道“如胶似漆”“买椟还珠”等成语的源头在漆器;采访了蜀锦传人,才知道所谓“锦绣”,锦与绣的区别:一是机织,一是手绣;采访了药师,才知道为何有“中医亡于药”的担忧,中药的炮制太紧要了——炮制之繁,必不敢省人工……

在作者笔下,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沧桑刻画出了大时代的线条。这既是一本为中国手艺人作传立书,又是对中国传统手工艺进行及时记录甚至是“抢救”的文艺读物。

手艺人与当代工匠之间有一个承接

本书所写的人物,只有一个不是传统手艺人,即排在此书最后的“钢构建造师陆建新”,这位钢构建筑的高工,荣膺“南粤工匠”殊荣,北上广深的不少地标性建筑都留有他的手笔。

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?因为手艺的问题不仅是弘扬中国传统的问题,还要与中国如何强大联系起来。钢构建造师陆建新身上体现的是一个承接,是传统手艺人与当代工匠之间

的承接。

陆建新属于创新类的当代工匠,他从钢结构的测量开始做起,陆续做到总工及项目经理。在此过程中,他脚踏实地,工作较真,不断钻研,改进了很多工艺,提升了建筑效率。中国的基建之所以被称作“基建狂魔”,正是因为有陆建新们在支撑。

像陆建新这样的有技术、有担当、有理想的中国当代工匠,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可贵品质与精神其实是与传统手艺人一脉相承的。如书中介绍的其他传统手艺人,漳州的八宝印泥传人杨锡伟为了保持八宝印泥的独家特点,要用八种乃至更多的中药材做传统印泥,确保印泥百年以上不变色。女儿要继承他的事业,但他想等女儿内心真正宁静下来,再完整地将原材料及技艺传承给她。

铁板浮雕师郭海博一路行来,困难迭出,问题常显,只有边纠错边发现前行。他告诉作者,从事铁板浮雕有四难:难以较快形成效益;材质坚硬,噪声大;累;需要扎实的美术绘画基础。此外还有两大前提:天生的兴趣,执着的精神。

真正沉下心来,埋头钻研,精益求精,是二者共通的品质。

其实,工匠原本就是手艺人,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的人,都无法离开最基本的手工制作的用具。传统手艺人与当代工匠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中的上中下游,他们都是手、脑、心并用的劳动者与创造者。

书单 翻书自然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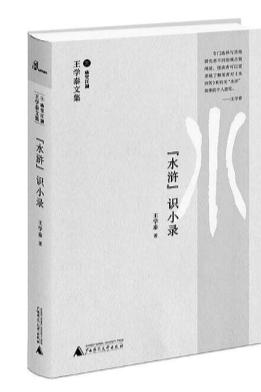
暑热难耐!

本周书单以小说类的书籍为主,既有历史小说的评说,也有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经历的书籍。

评论《水浒传》的书籍汗牛充栋,但王学泰先生的《水浒》识小录,融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新颖性于一体,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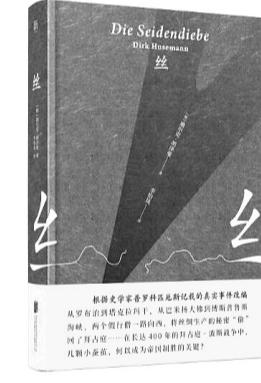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题材改编的小说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比如《丝》这本书就再现了拜占庭——波斯战争中的东西方商路的危机重重,由此,我们还能看到全球化贸易的作用。

此外,《奥斯特利茨》呈现出另一幅人生图景以及别样的阅读体验。人到底需要多少记忆?当孤身穿过时间,我们真正需要记住什么,面对什么?一个追寻真相的高贵灵魂,一幅奇异地梦幻的记忆拼图,从威尼斯到伦敦到巴黎,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男子,在理性与罪之间徘徊,穿越时间之雪,抵达先于身体的伤口。而在这一过程中,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也随之被揭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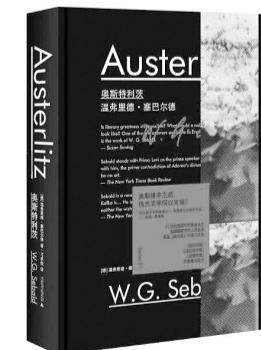
《“水浒”识小录》

评论《水浒传》的书籍汗牛充栋,但以王学泰先生的视角与方式来考评的,却鲜有论者与相关书籍。本书是作者关于“水浒”做的一些思考。作者采用了笔记体的方式,专门选择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观点进行阐述,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对《水浒传》和有关“水浒”故事的个人见解。其视角新颖别致,观点以小见大。如从朴刀、杆菌、武学生、山水寨、流放等细微处着眼,演绎游民文化传统下社会的运作思维与方式;其立论严谨,叙述生动,以考评为方式将“水浒”中的细枝末节与当时的整个江湖巧妙连接。



《丝》

本书是根据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历史小说,从塔克拉玛干到罗布泊,从巴米扬大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,在长达400年的拜占庭——波斯战争中,几颗小小的蚕茧,何以成为帝国制胜的关键?故事以丝绸之路为大背景,以丝绸为贯穿全书的线索,讲述了拜占庭人破解丝绸生产秘密的故事。里面包含了战争的残酷和逃亡路上的生死之困。归根结底,这一切都要与时间赛跑……



《奥斯特利茨》

本书是德国作家温弗里德·塞巴尔德享誉国际的代表作,也是其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。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,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“奥斯特利茨”后,终其一生追索自己的身世之谜。塞巴尔德以其独特的笔法和语调,突破传统小说文体的各种边界,将虚构与事实、记忆与历史、图像与语言、叙事与评论等糅合在一起,编织出一个既有理性的深度,又有感性的迷人的故事。通过奥斯特利茨,我们穿越到一片带着深不可测的时间感的广袤之地,一个由朦胧的画面与人影组成、笼罩于光与雾之中的世界,将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,还原出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。

阅读,不功利的愉悦人生

谷立立

所谓“书虫”,说的是极度沉迷阅读的人。常常,他们就像虫子一样钻到书页与书页之间,细心考究每一个词语、每一个句子、每一个段落,把作家的细腻情怀轻轻放在自己的心里。祝新宇正是这样一个“书虫”。他的新作名为《悦读者》,倒像是他的夫子自道:读书,不为急功近利,只为了体验书中那些愉悦人心的文字。

按照毛姆“作品即人”的论断,我们有理由从不同的作品中看到不同的面孔,进而衍生出若干不同的世界。阅读就是进入其中的门径。《悦读者》收录书评70余篇,谈论书籍70来部,也打开了70来扇通往世界的大门。借由阅读,祝新宇与这些遥远的、陌生的、文字的世界,有了最初的链接。全书共分三辑,分别命名为“无边风雪”“以火向生”“品质主义”。三部分各有侧重,既谈论历史名著,又不忘西方经典,更对当代作品投

去了关注的目光。显然,祝新宇对读什么、不读什么并没有一定之规。相反,他敞开心扉,来者不拒,将小说、散文、历史、社科等许多门类,统统拿了过来,誓要读出寻常生活难得一见的愉悦。

对于书评的好坏,祝新宇自有判断。他相信,好的书评不是人云亦云,不是内容简介,不是复制粘贴,而是要敢于“发掘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”。这表明,就算只是撰写一篇余兴文字,也要反复求证、认真下笔,唯恐稍有一点疏漏,就曲解了佳作。在《地坛》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里,他谈到了作家史铁生。世人都说疾病“成全了”这位轮椅上的作家,祝新宇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,斥责某些看法不厚道,“他们的台词是史铁生应该感谢疾病,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宁肯要一个坐轮椅的作家,也不要一个健全的普通人”。《人类为什么需要想象》一篇,他旁征博引,从徐来的《想象中的动

物》、钟鸣的《窄门》一路谈到了博尔赫斯,从不同侧面考证想象力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品中的重要性,显现出惊人的阅读量。

在谈论作品之余,《悦读者》也不乏有关作家的篇章。比如巴尔扎克,如果不清楚巴尔扎克来自资产阶级家庭,也就不知道他一生努力、不懈写作的终极原因只是为了挽救他那个濒临没落边缘的姓氏,为了给像他一样的富二代正名。《本雅明魔法盒》里有一个留恋1900年柏林的童年本雅明。他的敏感造就了他的回忆,也造就了这本薄薄的《柏林童年》。《梦蝶》一篇,祝新宇把诗人周梦蝶与唐朝诗人贾岛两相对比,将诗里诗外的清苦写了个清清楚明。“吟安一个字,拈断数茎须。古往今来,诗人总有些自虐倾向,其间也有点小小的快乐吧。”没错,自虐。不知道祝新宇在写作的时候,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体会。想来也该是愉悦大于一切。就算偶尔有不请自来的“自虐”,那又能

怎么样呢?反正,与阅读那“小小的快乐”相比,这点“自虐”简直不值一提。

卡尔维诺曾在《未来千年备忘录》中论述过文学的“轻逸”。这种“轻逸”在《悦读者》中显露无遗。祝新宇的阅读,不在乎著书立说,更不是让自己变成满腹经纶的学者,而是要一手一脚地创建他的阅读人生。不得不说,这样的人生很丰盛,很完美。借由阅读,他见识了鲁迅先生的“暗功夫”,结识了关爱旗下作家的天才编辑珀金斯,读懂了莉迪亚·戴维斯笔下字字珠玑的“一句话小说”……这难道不是阅读最大的乐趣?当然,祝新宇很清楚,书评再好,也不能取代原作。与其费尽心力,浏览书评,倒不如静下心来,扎实地读完一本书。甚至,他不乏幽默地奉劝我们,去读书吧,“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,读得下去就读。别相信书店的排行榜,更别相信别人的书评,尤其是那个叫瘦猪的糊涂蛋”。

“纸贵”的背后

陈 静

两晋南北朝时期的“纸贵”事件中,有一个有力推手——“传写”: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、笔、墨等材料,抄写复制文本。左思等作者完成作品后,没有交给书商去卖,而是由读者从市场上买纸来抄,贵的是纸,而非作品,经济收益与作者无关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纸已完全普及,“纸贵”是作品在短时间内、某个特定空间内,突然引发传抄热潮而造成的短期纸张供应不足现象。

“传写”引发“纸贵”

在上述事例中,作品均得到了名人推荐,最终引发“纸贵”。这一过程中,除名人推荐外,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推手——“传写”: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”(《三都赋》);“人人竞写”(《扬都赋》);“都下传写”(《谢庄哀策文》)。很显然,“传写”是造成“纸贵”的最直接原因。

何谓传写?简要讲,就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、笔、墨等材料,抄写(复制)文本,可以自抄,也可雇人抄(佣书)。“纸贵”事例中,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”,当有佣书人的身影;“人人竞写”,自抄与雇人抄都会存在。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,文本的复制与流传,靠的是“传写”。“传写”是汉唐时期文学作品传播的最主要方式。

“纸贵”是“传写”中的特殊现象,体现的是“传写”对作品公众传播的巨大作用。士人传写这些佳作,在社会上引发了从众心理,跟风抄写,造成纸张供应不足,纸价上涨,难以获得。那么,在蔡伦造纸成功后的数十年,是纸的推广和应用初期,纸的产量不高,不易获得。那么,在蔡伦造纸成功200多年后,两晋南北

朝时期,纸张依然存在产量不高、不易获得的问题吗?

如果单看“纸贵”数例,很可能会上有疑惑。但综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,就会发现,“纸贵”只是特殊现象,不能反映该时期纸张的真实供应情况。

首先,到东汉末年,纸张的供应已普及到地方与民间。东汉末年,山东半岛出现了一位民间造纸专家左伯,造出了比“蔡侯纸”更为优质的“左伯纸”。“蔡侯纸”产自皇家,“左伯纸”则来自民间纸坊,它标志着民间造纸渐趋成熟,说明造纸术迅速由宫廷向地方与民间普及。

其次,三国两晋时期,人们写信用纸,制作书籍用纸,写书法用纸,各级官方文件用纸,纸已完全普及到了全社会。如果纸张供应不足,如此大批量的用纸,是不可想象的。

第三,两晋南北朝时期,还发生过不少作品传写流传甚广之例,不妨拿来与“纸贵”对比一下。

裴郎作《语林》,始出,大为远近所传。时流年少,无不传写,各有一通。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)

(谢灵运)每有一诗至都邑,贵贱莫不竞写,宿昔之间,士庶皆遍,远近钦慕,名动京师。(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)

(刘孝绰)辞藻为后进所宗,世重其文,每作一篇,朝成暮遍,好事者传写,流闻绝域。(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)

(徐陵)每一文出手,好事者已传写成诵,遂被之华夷,家藏其本。(《陈书·徐陵传》)

这些传写事例,均发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。可以看到,传写已能远至偏远地区和异域:“好事者

咸讽诵传写,流闻绝域”(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);“遂被之华夷,家藏其本”(《陈书·徐陵传》)。传写也无分贵贱贫富,可直达底层民众。

东晋时的《语林》,“时流年少,无不传写,各有一通”;南朝宋时,谢灵运的诗作“贵贱莫不竞写……士庶皆遍”。宋、齐时卞彬的“文章传于闾巷”,“庶人”“闾巷”指向的人际范围均属社会底层。如果纸张供应有问题,偏远地区、异域、底层人群等,最不易于获得纸张,而实际情况是,上述这些作品,通过传写,全部轻而易举地普及开来。这充分说明,纸张的供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成问题。

那么,传写造成的都城“纸贵”,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笔者认为,这只能算作特例,是作品在短时间内、某个特定空间内,突然引发传抄热潮而造成的短期纸张供应不足现象,并不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状况。直到唐代,依然有“纸贵”记载,元稹与白居易的赠答诗,“江南人士,传道讽诵,流闻阙下,里巷相传,为之纸贵”。唐代,纸业生产已十分成熟,纸张供应,早已不成问题。因此,元白赠答诗的“纸贵”同样是特例,这里的“纸贵”甚至有可能只是比喻用语,形容作品流传之广罢了。

本文有关“纸贵”的思考,尚属浅层,还有很重要的问题,有待更大篇幅和更深入的探讨。如在“纸贵”过程中,谁在传写?书商参与其中吗?作者在“纸贵”中获得了什么?在著作权层面有何启示?对于此类问题,本文所论只能算浅尝辄止,期待更多同好参与其中。

(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传播系教授)